

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

金耀基 著

SPM
南方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

金耀基 著



SPM

· 广州 ·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 / 金耀基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 - 7 - 218 - 10603 - 8

I. ①中… II. ①金… III. ①中华文化 - 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9093 号

ZHONGGUOWENMING DE XIANDAIZHUANXING

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

金耀基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总策划: 肖风华

主编: 李怀宇

责任编辑: 刘奎 李怀宇

封面设计: 张绮华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 www.gdpph.com](http://www.gdpph.com)

印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47 千

版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前 言

自1966年出版《从传统到现代》到今年（2015年）出版《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前后恰恰是半个世纪，我撰写《从传统到现代》时正值三十而立之年，而今为此书写“前言”时已是八十的老年了。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性之研究是我一生学术志业之所在，五十年的书写一半是直接或间接环绕着这个学术课题的。

《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是应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李怀宇先生的邀约而辑文成书的自选集。此书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到现代》一书的承续与发展。这个选集所收的九篇文字是我半个世纪中，在不同时间，对中国的传统文明在现代转型中出现不同层面与层次的“问题”的论述。各篇之间，互有贯通，间多重复，但皆独立。下面我拟对每篇文字作一简介，以助读此书者更多了解我撰文之动念与用心。

首篇《中国现代化与文明转型》一文是我半世纪来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性研究的最新一篇文字。这是2014年3月我在台湾高雄西子湾中山大学“余光中讲座”的讲词。此文是对历时150年、跨越三世纪的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综合通贯之诠释。我特在此文中疏解我近年提出的中国现代化的三个主旋律，即

（一）从农业社会经济到工业社会经济；（二）从帝制君主到共和民主；（三）从经学到科学。这三个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不止是造成了社会的大转变，而更是造成了中国的传统文明向中国的现代文明的大转型。百年来，中国现代文明的出现是真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的现代化》一文是我半世纪里中国现代化书写的第一篇文字。它也是我1966年出版《从传统到现代》一书的中心论述。自我撰写此文时起，中国现代化是中国未来唯一的出路，成为我的信念。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很不平坦，甚至是荆棘满途。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在台湾出版《从传统到现代》时，中国大陆却正爆发了全面反现代化的“文化大革命”。令人欣慰的是，1978年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推行“四个现代化”，重新回到百年现代化的轨道上，拙著《从传统到现代》也于此时在我不知悉情形下，有数个不同版本出现在神州大陆。当拙著的增订版2010年在北京法律出版社问世时，中国大陆在现代化上已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作为五十年前书写《中国的现代化》的作者的我，内心的感受，不言可喻。

《中国“现代转向”的漫长革命》一文，写于2000年，距《中国的现代化》一文已三十四年，这三十四年中最大的变化是大陆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重上现代化的征程，并且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中，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当第三个千纪年（2000年）来临之际，中国大陆，与亚洲“四小龙”的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都已晋身为新兴的工业化社会。事实上，中国在进入第三个千纪年或二十一世纪启始之日，中国在经济、政治、教育、学术等领域已全方位地转向一个

现代型的社会文化。我此文指出，中国的“现代转向”是15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所展开的。中国现代化自十九世纪中叶，因鸦片战争引发的曾（国藩）李（鸿章）洋务自强运动起，历经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前后跨越三个世纪。我借英国雷蒙德·威廉斯（R. Williams）的名著《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的书名来叙说中国现代化的漫长的社会、文化根本性变化的历史。

《东亚另类现代性的兴起》一文是2001年春在柏林举行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之论文的中译。此文我是把中国的现代性之构建放在一个世界框架中来讲的，并且我是把中国现代性的兴起与东亚之全面崛起连系起来的。东亚在世界文化地图上形成一个“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与儒学有千丝万缕的关连。无疑地，二十世纪下半叶，东亚之升起是一最耀眼的世界现象。东亚各国在长期现代化中构建了具有东亚文化性格的现代性。文中所谓“另类现代性”是对应于三百年来最早出现的“西方现代性”而言的。

《儒学、现代性与亚洲的民主》一文是1995年1月在夏威夷由夏威夷大学与东亚文化中心合办的第七届“东亚哲学家会议”中宣读的论文之中译。此文之作在思考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之构建中中国现代政治秩序的问题。无可讳言者，共和民主是中国建国的宪政理念，民主又是建构中国现代政治秩序必经之路，但民主在实践上有多种形式。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中国的民主实践必不可能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1989年东欧的民主化浪潮高涨时，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喊出“历史之终结”之声，他说我们正目睹着人类意识形态演化过程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将作为人类最后的政体形式而得到普遍实现。当

然，福山的历史观点很快就被历史所否定，他自己此后的观点也有很大转变。我此文提出民主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产物，它之能否普世化触及到文化与现代性的问题。西方的现代性是以个人主义为一个基本元素的，而个人主义也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核心，但我们知道，亚洲，特别是中国，所建构的现代性并没有个人主义的文化基因。中国的民主实践不会是、也不可能是“自由主义民主”，中国的民主将是民主与儒学文化理念结合的形式。我称之为“民主的儒学”（democratical confucian）。在这里我应一提，我在首篇《中国现代化的文明转型》中，我提出中国现代化的三个主旋律，其中第二个旋律是“从帝制君主到共和民主”，这是指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而说的，而此文就是对此一课题的一个探索，有兴趣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问题的读者，可以参考拙著《中国政治与文化》（此书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增订版）。

《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诠释》一文，原是1990年在新加坡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的论文之中译。此文主要对东亚经济（四小龙）之所以能取得重大发展提供一个文化的诠释。诚然，这是我对八十年代学术圈提出的“后期儒学命题”的一个回应。东亚经济巨大发展的经验现象对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新教命题”，尤其是他对儒学伦理是阻碍中国经济秩序变革的论断引发了重要质疑与争议。我此文及我在1983年所作《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二文皆收入拙著《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增订本）都是对此一学术争议的分析与看法。

《现代化、现代性与中国的发展》一文，原是1997年4月在由北京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

与社会学系共同主办的第五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文稿。这个“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从第一届1983年起到2003年第八届，前后21年，是两岸三地社会科学界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学术平台。北大的费孝通先生是这个平台创始人之一，香港中文大学的乔健教授对这个平台21年成功运作贡献最多。费先生每届都必亲与并发表论文，我对这位在世界享有盛誉的前辈学者的治学为人，留有深刻印象。我的这篇文字是有意对这个研讨会以“现代化与中国文化”为宗旨而书写的。此篇万余言的长文，是把中国现代化的论述与西方于八十年代对启蒙思想家所设计的“启蒙方案”（或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方案”）的论辩放在同一语境来思考。此文更特别剖析二次大战后发展的美国现代化理论的意义与盲点。无论是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或启蒙以来的“现代性理论”，如哲学家泰勒所指出，都没有给“文化”一个理论位置。我个人五十年来的中国现代化的书写，深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启发与影响，但我自始就强调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此所以我在此文中论述中国的“发展”必须是中国的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建构的现代性也必然是中国的现代性，亦即是一个有“中国性”的现代文明。

《现代性、全球化与文化认同》一文，原是1998年我在台湾中山大学的一篇讲词。此文我是从二十世纪末叶风起云涌的“全球”化现象来思考中国现代化的取向以及建构中国现代性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全球化在这个阶段已经与“全球现代化”的现象不可分了。最值注意的是，全球化并没有淹没或摧毁各国“本地”文化。反之，全球化却激发了各地的民族文化，亦即全球化是激发了“他者的文化”，因此，在经验上全球化是

与“现代性的本地化”同时共存的。文化的认同在全球化中是加强而不是减弱。

《文化自觉、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之构建》一文，是我2007年在北京大学“费孝通纪念讲座”的讲词。费先生是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的前辈学人。他终生献身学术，抱学术兴邦、知识富民的襟怀。费先生在学术生命最后的十年中，关怀最切、所思最多的是“全球化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也即改革开放开始的年代，正遇上第三波的全球化。全世界变成地球村，是人类一个大接触和大交融的时代。这就带出一个世界不同文化的人如何和平相处的问题，更带出一个民族文化如何自主存在的问题。以此，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观点。我这篇论文就是对这位伟大学人“文化自觉”呼声的一个回应。我此文对全球化现象的分析，可视为是我上文《现代性、全球化与文化认同》对全球化问题进一步的疏解。全球化与上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全球现代化”是密切连系的。中国现代化后期发生的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认同”是中国现代化从上世纪上半叶的“西化”中走出来的。中国现代化主要的是从传统到现代的“时间”度向的“现代性问题”；而在全球化脉络里，已转为一个以“空间”为度向的“全球性问题”。

“现代性问题”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全球性问题”是全球与地方（本地）的关系。简单的现代化理论错误地以为“现代”会取代“传统”，事实上，现代中必然有传统的元素；成功的现代也必然依赖传统转化的文化资源。同理地，简单的全球化理论错误地以为全球会淹没本地，事实上，全球化不但不是淹没了本地文化，反是激发了本地文化（在中国是激发了有深厚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再生）。所以我早年曾说：“没

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今天我要说：“没有‘没有地方’的全球化。”历史的经验越来越显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全球多元现代性”，而中国的现代性，必将是一个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文明秩序。

《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这本自选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过去五十年对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性的书写。不过，在此我需指出，我对百年中中国学术与文化的变化（亦即本书提及的中国现代化其中的一个主旋律：从经学到科学）在这个选集中并无专文收入。实际上，在我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论述中，“从经学到科学”的转变是最根源性的，这也是我过去十年中学术书写的重心。我的《再思大学之道》一书将问世，对本选集有兴趣或有共鸣的读者，幸垂注焉。

这个自选集的主题是论述从十九世纪中叶起，150年的现代化运动已使中国从以农业为本的古典文明转型为以工业为本的现代文明。2013年我在另一本名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的自选集中指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不止是寻求中国的富强，而更在构建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诚然，今天已经出现了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的基本形态，但它还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还不断在学习、提升、反思、完善、持续的试验中。如果再有三十到五十年的和平环境，在21世纪里，一个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中国的现代文明将可修成正果。对此，我是有所憧憬的。我也深信，这是中国人的历史共业。

金耀基

2015.8.4

目 录

前言	(1)
中国现代化与文明转型	(1)
中国的现代化	(20)
中国“现代转向”的漫长革命	(61)
东亚另类现代性的兴起	(93)
儒学、现代性与亚洲的民主	(114)
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诠释 ——论香港的理性传统主义	(142)
现代化、现代性与中国的发展	(166)
现代性、全球化与文化认同	(191)
文化自觉、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之构建	(207)

中国现代化与文明转型

1. 从传统到现代的大转型

从清中叶到今天（2014年），时序上说，是自十九世纪，历经二十世纪，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跨三个世纪的历史过程。这一百五十多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虽是短暂的片段，但却是中国一场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它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社会的大转型（societal transformation）。

中国这个历史剧变，这个社会的大转型是清中叶时，西方帝国主义以武力叩关，打破天朝中国的“光荣孤立”而掀起的。晚清大臣李鸿章，目睹清王朝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侵逼下，有大厦倾圮之危，因而有“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言。李鸿章，这位屡签丧权辱国之约的大臣，事实上，可能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大的政治家。他是认识到清王朝所面对的西方列强之挑战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之“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说法是有历史识见的。当然，他未必能预见到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变局。

自鸦片战争迄今一百七十多年，中国的历史之路在前一百年可谓曲折崎岖，风雨连天。改革与革命交相迭替，内忧外患

如影随形。国族的命运时沉时升，时明时暗，其间有壮丽的艳阳天，也有乌云蔽月的长夜，直到上世纪七〇年代后，中国的大地上才出现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向上的发展机遇。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固已与韩国、新加坡跃居亚洲“四小龙”，成为称誉一时的“新兴工业化区域”；中国大陆于1978年标举“改革与开放”的大旗。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荒墟上，开启了没有硝烟的新长征，自此国运翻转，换了新天。到了九〇年代，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已是“世界工厂”；进入二十一世纪，加入WTO，中国融入世界，世界亦进入中国，今日中国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诚然，今日中国虽问题重重，困难如山，但中国的历史之路已走到了一个满怀远景的新境地。

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中国的历史之路充满挫折与伤痛。一方面，外力之侵害不绝（如清末西方包括由亚入欧的日本帝国主义之殖民瓜分及民国时期日本之侵华），大大扭曲了中国正常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内自身的种种负能量（如军阀之割据、内战等）也使国族陷于长期的劫难。但是，自洋务自强运动以来，维新改革以及清末新政、辛亥共和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伐、抗日、共产党建国、1949年后国民党在台湾推行经建与宪政民主、1978年大陆改革开放拨开“文革”的阴霾，推动“四个现代化”，中国始终有一股正能量，在种种逆境中，百折不回、有方向性的往前发展，这一股历史的正能量就是中国断断续续、绵延不绝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正是这个一百五十年的中国现代化运动，造成了中国的巨大的“社会转型”，而这个社会转型事实上是中国文明的转型，由一个前现代的农业文明转向一个现代的工业文明。这个中国现代的工业文明与三千年来传统的农业文明，在经济、政治、教育、学术

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新的面貌。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这确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966年，我在台湾出版《从传统到现代》，此书主题意在诠释中国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运动，也即是从一个“前现代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文明转型”。2004年，我在香港出版《中国的现代转向》。两书前后相隔三十八年，我已由三十一岁的壮年进入“古稀”之年，在这三十八年中，我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解固有增长，而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则更在现代化的快速道上，但是我对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看法是前后一贯的，并没有像梁启超“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两书最不同的是前书着重“时间”（或历史）视角来看中国从“传统”到“现代”中展现的“现代性”，后书则着重“空间”视角来看中国现代化在全球化中展现的“中国性”。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

（一）《从传统到现代》的现代化运动，讲到深处，是中国的文明转型，即由一传统（农业）文明转为现代（工业）文明。在这转型中，“传统”绝非与“现代”是二元对立的，现代化绝不是推倒一切传统。事实上，传统是一复杂体，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些传统是会被淘汰的，但有些传统则会转化，并可转化为现代化的正能量，即传统非但无碍于现代化，反而可以促进、丰富现代化。故我在1979年写过一篇《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的文字（此原为何怀硕《艺术、文学、人生》一书之序）。诚然，只有有传统的国家，现代化才能真正精彩。事实上，经验证明，有些前现代文明的传统，不但可以在“现代文明”中存活，而且可以强化、丰富“现代文明”的内容。在今日中国，国画、书法、京戏、昆曲都是例子。余光中

先生的新诗之所以有如许魅力，是因为它有汉魂唐魄，是因为他承继了诗（经）、骚（离骚）开展的文学（特别是诗学）的传统。在这里，我想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有积极意识的批判传统文化的运动，它批判的核心是传统的经学，而不是传统的文学。

（二）上世纪七〇年代以来新一波的全球化风起云涌，在世界范围内，有些弱文化传统的国家，真的被“平化”，失去了本身的文化性格。费孝通先生晚年关怀最切的问题是在全球化下，中国文化（或其他文化）如何自主存在，以及不同文化的人如何在“地球村”和平相处，并提出“文化自觉”的观念。费先生去世后，我于2007年在北京大学“费孝通先生纪念讲座”发表了《文化自觉、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之构建》的讲演。我认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真正展现的文化现象是“全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此一词是英国社会学者罗伯逊（R. Robertson）所创。新一波的全球化之所以是一个遍及全球的文化现象，根本的原因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已出现了一个“全球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经济的现代化）使中国与世界先进社会有了更多交流与接轨。在全球化的文化领域，诚然有一“同质性”的趋势，我们从各国大城市中衣、食、住、行的文化类同现象可以看得很清楚，但这里，我们更看到“全球”与“地方”（local）的辩证关系。全球化的真实情形并不是“全球”淹没了“地方”，反是激发了地方（民族）文化。事实上，在全球化大潮下，中国的民族文化反而更自觉地焕发生命力。所以，现代性问题涉及传统与现代两者之关系。在前者，我曾说“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在后者，我要说，“没有‘没有地方的全球化’”。

2. 中国现代化与文明转型的三个主旋律

中国现代化促成了中国文明的转型，这个转型涉及中国文明的几个方面与层次。我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指出的三个层次是：

（1）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

（2）制度层次的现代化；

（3）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

近年，我提出中国现代化的三个主旋律，也是中国文明转型的三个主旋律；这是我从中国一百五十年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抽绎出来的理论性表述。当然，这也是循着我1966年发展的中国现代的三个层次的进一步发展。

（一）第一个主旋律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故事，也是中国现代化和文明转型的基础，即中国由一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今天已有信息工业或所谓“第三波工业革命”，但仍属于工业文明。）中国过去有工艺制作（陶艺足为杰出代表）但无工业生产。十八世纪的西欧（特别是英国）将科学知识应用于生产技术，因而有工业革命之发生。工业革命是历史上改变人类文明性格最大的力量。中国的工业化不是内发的，而是外力逼出来的。中国之走上工业化的第一步是鸦片战争清廷失败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发动的洋务自强运动。国人当时自觉到中国之所以败，之所以不如西方实在科技，即是在枪炮船舰，自强之道必须学夷之技，故而以“开铁矿、制船炮”为洋务之首要。这可以说是中国的国防和军事工业化的开始。当然，洋务也不限于

国防军事。事实上，官方与民间在多方面都展开了基本的工业化，如电灯、电话、铁路等都次第兴建。

我们知道，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中是证明失败了，那是说中国第一轮的军事现代化是失败了，但由洋务自强运动带动的工业化却在中国土地上渐次生根。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虽是艰苦崎岖的，百年来，国难频频，1912年共和建国后，即有军阀之割据、日本之侵华，无不阻滞了本国工业化之步伐。抗日胜利后，又起国共内战。中共建国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虽取得可观成绩，但之后的“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却长期地扭曲了中国工业化之路，上世纪八〇年代形势丕变，香港、台湾跃升为亚洲“小龙”，成为最成功的新兴工业社会，而1978年中国大陆乾坤翻转，在改革、开放大纛下，全力推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到了九〇年代后期，中国工业化之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世界工厂”，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因此急速地处于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

中国百年的现代化，其中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便是主旋律之一，这是中国由一农业型文明转向工业型文明的基础。此一转型使中国文明出现了全新面目。中国三千年来，朝代更替，不知凡几，但无论秦汉、隋唐以至宋元、明清，也不论是盛世或衰世，始始终终是一农业文明。而自十九世纪末，历经二十世纪，再到今日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已一步步转型为一工业文明，这是中国三千年来前未曾有之大变局。

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中，社会的物质世界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价值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人的生、老、病、死，日常的衣、食、住、行，都有了变化。简言之，今天中国人的